



重返清华园引起的回忆

○王君钰（1950届化工）



王君钰学长近照

我今年已97岁，闲暇时间常常回顾过往的人和事。我觉得一生中最难忘的还是七八十年前在清华大学的学习和工作。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日后的一天，趁着腿脚尚好，我特意重返清华园，游览了那些熟悉的地方，拍摄了好多照片。一晃又是十几年过去，今天的我已行动困难，只能翻看那次拍摄的照片，以此来表达自己对清华母校的怀念。

故地寻踪

还记得那天我是一人返校，已经看不到嘈杂的人群，也没有游客在校园内穿梭，清华园又恢复了往日的安静。我沿着自己过去每天学习生活走过的道路，一点点地观看回忆，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和助教时的生活。静斋，这座三层小楼我住了三年。1946年我刚入学时是先住在古月堂的，大一下学期搬到了静斋。当时有句话是“静斋不静”，说的是新中国成立前静斋是男生的禁区，他们来找女同学时，只能通过静斋的校工大声叫着某某某有人

找！当年的静斋还有一个特点：耗子多。因为女生吃零食多，所以就容易招耗子。我们宿舍的一位女生有一把六弦琴，一天夜里耗子从琴上溜过，发出了令人哭笑不得的琴声。

1950年我大学毕业后作为清华大学的一名助教，又搬回古月堂，住了两年多，一直到1953年结婚我才搬出来。古月堂东侧就是工字厅，我丈夫武迟是清华大学1936年毕业的学生，他考取第四届公费留学美国，1950年回国后就住在工字厅大门东侧的一排房子里。

我又走到了二校门，我们上学时二校门两旁是有围墙的，二校门前总停放着两辆清华校车，往返于清华大学和北平城里南池子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地址）之间。它是我们进城时唯一的交通工具。清华校车是以二校门为起点，走西校门出校，经海淀镇再从西直门进入北平市区，进城后再经新街口大街，路过护国寺、太平仓（现称平安里），途经西四牌楼北大街（西四牌楼现已拆除），终点站是南池子骑河楼清华同学会。

我来到清华学堂，站在楼前，1946年父亲送我来清华报到时的情景浮现在我的眼前，终身难忘。因为从那时起，我就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这是我一生的骄傲和自豪。我1946年在辅仁中学高中毕业，做数学教授的父亲为我选择专业，考虑到大哥王兆霖（清华土木系暖通专业创建人）、姐姐王炜钰（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以及

另外三个哥哥先后学习了土木、建筑、采矿、冶金、机械，便要我学习化工。当时清华、北大、南开刚刚从昆明迁回，三校联合招生，但考生只能报考其中一所，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清华大学化工系。

学堂旁边是同方部，是我们大学一年级上微积分时的课堂。这栋老旧的建筑还一直保留着，当时是清华校友总会的办公地点。同方部北侧，当年是二院，曾是我们化工系旧址，可惜早已全部拆除改建。大学一二年级时，几乎全是和外系同学一起上大课，每天奔跑在化学馆、机械馆、二院这些系馆之间，全得是小跑前进。

在清华读书时，好几位大师级老师都教过我们。张子高先生教我们“普通化学”，曹本熹先生教“化工原理”，张维、钱伟长两位先生在机械系馆同时开设力学课，大家可自由选择。我选择了听张维先生的课，张先生的口才极好的。

当年二院化工系旁就是大礼堂，是我们学生活动最多的地方。合唱团及剧艺社全在那里演出，当时竞争学生会主席的演讲也是在这里进行，还有一些领导来校作政治报告都是在这里。1950年毕业前，我们全班24名同学和老师们坐在大礼堂前台



清华大学化工系1950届毕业合影。第二排均为教师，左6为曹本熹教授，左7为陈新民教授；第一排右1为王君钰

阶上，照了一张毕业合影，我一直珍惜地保存着，它留给我太多的美好回忆。

这次返校，我心中既有感慨，也非常激动。往事历历在目，过去的岁月就是历史，我也是这些历史的见证人。

返回刚刚解放的清华园

1948年12月13日，清华园内听到了炮声。我记得当天上午我们正在同方部旁边二院教室上课，陈新民教授为我们讲“物理化学”课。当时大家有些惊讶，但也想到这是北平即将解放的前奏。中午，我们这些家在城里的同学纷纷乘清华校车进城，想着回到城里和家人在一起等待解放。

校车还是从西直门进入城区，直达骑河楼清华校车终点站。那时，大家想着北平解放也就是再等几天的事，但没想到12月15日清华师生就迎来了清华园的解放，而我们这些匆忙跑出来的同学们却被关在了城里。当时北平的所有城门全关上了，城门内外已经是两个世界。我们心急如焚地等着解放，骑河楼清华校车终点站就是大家的集合点，到那里总能打听到学校的一些情况，我最关心的还是解放军进驻学校后何时复课。国共双方在如何解放北平

的政治谈判上争执不下，可我们是学生不能一直等待，尤其听到清华大学即将复课的消息，我不能再等下去，决定和几位同伴一起步行回校。

在骑河楼校车终点站那里了解到，北平所有外城门全都关闭，当然也包括西直

□ 回忆录

门和德胜门。唯一的出口就是德胜门旁边有一个豁口，是在城墙上扒掉一些砖露出的豁口，不是现在的豁口大街。那里检查不严，如果步行可以从那里出城。出城后要经过一段国民党管辖区，再经过一段国共两不管区域，然后就到达解放区。步行路途中两头还比较安全，只是中间的两不管区人烟稀少，可能会有打黑枪的，这一带要特别注意安全。现在想来，我们能顺利地步行返校也是有组织在帮助进行的。

走前，老爹想得更周到，他说路上安全非常重要，但是两边币制不同，到校后交不了饭费也是问题。他拿出两个银元让我藏在棉鞋的鞋垫下面，说到时候也可能用得上。当天，我一大早带上干粮和水，再背上书包到指定地点集合。大概有四五位同行者，大家彼此也不认识，但是共同的想法就是赶快返校。在豁口处有国民党军把守，一般性地查一下就放行了，出城后仍是国民党管辖范围，心里也并不紧张。当渐渐地走近两不管区时，自己心里也开始有些紧张了。远处听到几声狗叫声都有点害怕，怕有人跳出来，怕有人打黑枪。我们几个人只能加快步伐快速前进，走了一段时间，突然远远地看到了几个穿棉军装的士兵，有人立即喊：“那是不是解放军？”我们几个人一起望去，当时就像见到亲人一样，都松了一口气，我们已经进入解放区了，清华大学就在前面。

从早上出发整整走了十几个小时，我终于来到静斋门口，那阵阵小米饭香味扑鼻而来，我忙着问迎接我们的同学到哪里交饭费，怎么交法，他们说，我们现在全是免费，不用交钱。教师发工资也全是按多少斤小米计算。他们让我赶快休整一下，吃完饭去大礼堂看演出，有解放军文

工团慰问演出歌剧《血泪仇》。我那时候并不想去，一方面是太累了，另外想着八路军的歌剧还不就是有几把二胡扭个秧歌啥的。但是在别人劝说下，也就去凑凑热闹。进入清华大礼堂，正式演出还没开始，但是乐队成员已经入座，正在调试乐器，有小提琴、大提琴，还有双簧管、长笛等等，这就是小型的管弦乐队，已经不是几把二胡了。大幕拉开后，灯光、布景、音响效果全都出乎意料，剧情虽然和白毛女类似，也是描写农村地主剥削农民的故事，但是艺术表达方式和过去相比，真是鸟枪换炮。我看完以后觉得自己太落后了，原来一直叫八路军为土八路，现在才知道八路军并不土，他们在方方面面已走在时代的前列。

参加腰鼓队

我1946年考入清华后，每天生活就是宿舍、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几个点轮着转，参加的业余课外活动比较少。我自认为不是政治上进步的人，但内心还是很有正义感的，那些“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对美军暴行”等运动也都跟着参加了。

我还参加过清华合唱团，著名音乐家张肖虎任指挥，选的歌曲中印象最深的是白居易的《长恨歌》，男女声四部合唱，曲调音色都非常优美，那时确实满足了自己的“小资情调”，唱歌也是一种享受。但是解放了，时代不同了，这种优美动听的音乐被认为是脱离劳动群众、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大家共同唱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呀呼嘿伊呀呼呀嘿……”人们一边唱一边



1950年，清华大学腰鼓队参加五一节游行前的合影。前排左3为王君钰

扭起那时最流行的大秧歌。还有敲大鼓的、打镗的，大家跟随鼓声围着扭秧歌。扭秧歌是群众性活动，但我觉得观赏性差些，可是一旦背上腰鼓，就大不相同。可以边走边敲，还可以敲出各类鼓调，男女双方停下来还可以对敲，它又像一种舞蹈。总之，打腰鼓很快就成为我的课外活动和爱好。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腰鼓队，我们班上男同学梁秉维也是打腰鼓的爱好者，我们还可以结成对子互相对打。它既能锻炼身体也能陶冶情操，我没想到自己也能从“小资情调”中跳了出来，挎上腰鼓走进游行队伍中去，直奔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下厂实习

1949年6月，我们入学已三年了，虽然参观过工厂，但还没有正式到工厂实习过。当时东北是国家的重要工业基地，系里决定让全班同学走出课堂，奔赴生产第一线。

我们先到了沈阳东北化工局，然后再分配到所属的各化工厂。我万万没想到班上四个女生却被分到了四个工厂，她们三人当天全被各自的工厂接走，只剩我一个女生和五六个男生留下再住一天，第二

天才能去抚顺石油二厂。当晚，化工局的领导还招待了我们。东北人十分热情，用大海碗给我们倒上啤酒，酒桌上的领导说话也不那么严肃了，几位男生全是一饮而尽，我是滴酒不沾，害怕得要命。饭后回到住宿房间，实际是个教室，一人躺着不敢睡，用椅子把门再顶上，外面的衣服都不敢全脱，硬是熬过了这一夜。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出远门留下的记忆。

第二天，我们从沈阳到达抚顺石油二厂，这是一个日本人留下的尚未建成开工的大型炼油厂。因为没有开工，所有设备全可以钻进去，对照流程设备图看个究竟。我们每天上午到现场实地观察，下午回宿舍整理报告，而中午全要在烈日下走上一小时，小路两旁没有树荫，只有大片玉米地。有一天，同行的一个男生忽然异想天开地说，玉米秆最解渴，前面玉米地里就有，我去找点解渴的，说着就走进玉米地。他一人走在前，我们正要随其后，只听远处有人高喊：“站住！”那同学本能地高举双手一副投降的架势，我们抬头远望，原来玉米地的另一角建了一个炮楼，有人端着枪正朝我们高喊，看来我们是走入了禁区。我们连忙往后退，前面那同学双手高举的姿势后来变成了大家的一个笑料。

大学毕业后

1950年是我大学即将结束的一年，回想1946年入学时我们班有近60人，由于各种原因，部分同学中途离校或推迟毕业时间，只有我们24人能按时毕业。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大学毕业都将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系里要求我们填写毕业分配志愿表，这张表也可能就决定着我们每个人的前程，但是所有人几乎全填的是“服从组

□ 回忆录

织分配”六个大字，没有人提出任何讨价还价的要求。化工系是清华新成立几年的系，除了系里要留几人任助教外，其他人有分到机关的，如化工部、食品工业部、林业部，也有直接分到基层的，如其他省市的高等院校、炼油化工厂等。大家全是服从组织分配，愉快地走向工作岗位。

分配时，我被留校做助教。第一个任务是给陈新民教授做“物理化学”课助教，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因为陈先生还担任很多行政职务，所以他特别忙，很少见到他。作为助教，自己首先要吃透教材，整天忙着辅导学生，为他们答疑，做习题批改作业，忙得晕头转向。可是不到一年，主讲教师又换成了从美国归来的唐有祺先生，教材也随之变为另一本全英文的新教材，我的压力又陡然升高，只能硬着头皮一点点啃下来，完成自己的助教任务。

1953年，迎来了大规模的全国院系调整，清华新成立的石油系扩大为北京石油学院，我也就离开了清华园。

在石油学院，我又成为傅鹰教授的“物理化学”课的助教。他是一位让我最为崇敬的老师，他对我的培养和帮助让我永生难忘。他不但教我怎样做学问，还教我做人；他会拿出一个章节，指导我来主讲，手把手地教我、指导我。在他的培养下我心情舒畅，也得到很好的成长。

然而，时间不长傅鹰先生就被调至北大，在严重缺人的情况下我也只能顶上去挑起了“物理化学”课的主讲任务。那时一个年级有六个班，180人，要完成教学任务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我响应号召积极改进教学方法，受到各方面肯定，还曾作为代表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北京市的

“文教群英会”，这算是一个很高的荣誉。我于60年代初晋升为副教授，在同龄人中是晋升比较早的。

那时候各种运动、劳动特别多，作为被改造的知识分子我曾跟随学生去燕山石化参加劳动，天天“打眼放炮，吃饭睡觉”。我是把钢钎的，另外在炼化设备上爬高爬低，现在想起来还害怕。学生参加劳动、运动占用的时间非常多，我从心里为学生着急，便主动召集学生在晚间补课。可是，这也遭到了批判，说我是“补黑课”“走白专道路”，让我很心寒。

1969年，上级命令石油学院搬迁至山东东营，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真是不堪回首。上面下来通知，三天之内必须搬，我们只好手忙脚乱地开始打包。我们也不会包装啊，所以那么多玻璃仪器、天平、器械，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东营新校址就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给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困难可想而知。后来因为丈夫武迟所在单位石油部下放湖北潜江，同意家属随行，我这才带上两个女儿跟他去了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大儿子这时已经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干校生活

1970—1972年间，我们在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度过了两年。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实际是当地一个劳改农场的旧址，那里血吸虫泛滥，有几排破旧不堪的房子。开始时男女分别住在大集体宿舍，后来学员们自力更生建起一些简易住房，1970年初每户可以分到一间房，我们才有了自己的家。我既要去大田劳动，还要照顾身体虚弱的武迟。他开始被分配去放羊，每天手挥羊鞭追赶着羊群，从体力上还能勉强胜

任。后来让他去大田劳动，干的是挖沟挑土的重体力活，他本来腰就不好，还患有胃下垂、胃溃疡等多种疾病，所以这些体力劳动造成他三次胃出血，被医院强行扣下住院治疗。之后才让他改换工种，干些力所能及的轻活。

在干校最可笑的一件事是“龙口夺粮”。小麦成熟了该收割了，但却下起了大雨，按理要等晴天小麦干了再收，可是干校领导却要求冒雨抢收。我们走在泥泞的麦田里，拿着剪刀剪下湿漉漉的麦穗，再送到麦场。不出所料，那些麦子都发了霉，颗粒无收！

1972年，我们结束干校生活回到了北京。我进入了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成为一名科研人员，先后在重整催化剂研究室任主任工程师、教授级研究员，1993年退休。在20年的科研生涯中，我作为主要成员完成多项重要成果，获得多项奖励，如1989年“CB-6低铂铈重整催化剂及工艺技术”获中国石化总公司一等奖，1993年“含沸石的烃重整催化剂”“沸石的改进方法”科研项目先后获得中国石化总公司颁发的发明证书。

丈夫武迟

我的丈夫武迟是清华大学化学系1936届（八级）学生。他是一位热血青年，读书期间，他积极参加了“一二·九”爱国运动，曾被当时的北平公安局抓捕。大哥武奋从上海专程到北平公安局交涉，设法营救，才在数星期后被释放。他的母亲受此惊吓，于1936年病逝。

武迟在化学系就读时成绩优秀，曾获得理学院奖学金。1936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36



武迟、王君钰学长结婚照（1953年）

年他考取了第四届公费留美，他的理想是科学救国，于是从此改学化工。

他1939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为了积累实践经验，他放弃了读博士的机会。1939年武迟到美国纽约世界贸易公司任职，曾在著名化工专家侯德榜先生领导下工作，并成为化工设计室工程师。这期间，他曾到美国的化工厂、炸药厂以及加拿大的化肥厂、炸药厂实习，他的实习涉及合成氨、硝酸制造、硝酸提浓、硫酸制造、硫酸提浓、TNT制造、硝酸甘油制造、无烟火药制造，等等。他不仅编写详细实习报告，而且为国内兵工厂设计化工装置提供技术数据，在这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基础和实践经验。同时，他又广泛地查阅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化学工业的一些重要技术数据，与施铨元先生一起编写了《基本化学工业工艺》一书，该书内容丰富，成为他回国后教学的主要教材之一。

1949年夏，武迟接受了清华大学的电聘，于1950年回到了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任职于清华大学化工系、石油系，他曾经是我的老师、同事。我们于1953年在清华园结婚，婚后育有三个孩子。院系调整后，他在新成立的北京石油学院担任炼制系主任，后来又先后在石油部、石油化

工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工作，为中国的石油化工科学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8年3月去世。与他共同生活数十年，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位杰出的、爱国的科学家，我非常敬佩他。

时光穿梭，岁月更替。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我心目中的清华精神从没改变，我怀念为清华作出贡献的老师们，怀念在清华曾经历过的日日夜夜，我为自己是一名清华人而骄傲。

2026年3月

一次突然的造访 ——怀念我的伯父梁思成先生

○ 梁任又（1967届工物）

1962年春天的一个周日，我和我们工物系七字班的十几个同学到颐和园游玩，回校时路过我二伯伯梁思成先生的家，大家临时起意造访了他家。

我们十几个人把他的书房挤得满满当当，他坐在书桌旁很高兴地跟我们谈了很多。他说，建筑是研究人的需要，是活的，你们学的是物质，物体可以失败，可以重复，建筑不行。他说，建筑是一个美的学科，它妙就妙在“千篇一律”和“千变万化”。



梁思成先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梁家书房。本文中，梁思成先生就是在这个书房里跟同学们交谈的，当年同学们坐在这个沙发上，他坐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

知道我们刚从颐和园回来，他就从颐和园的长廊讲起，说那是“千篇一律”的典型。他说，设想长廊的柱子，如果不是统一规格，而是一根方、一根圆、一根多边形，再或一根红、一根绿，长廊将变成什么样子？正是他的“千篇一律”，才让我们站在长廊上一眼望去是无尽的远方，才有了长廊带给我们的特殊感受。而长廊横梁上每一幅绝不重复的绘画又是“千变万化”的体现。

从颐和园他又谈到了故宫，说故宫的建筑是中国古建筑“千篇一律”和“千变万化”的集大成者。从天安门进去到端门、午门都是一间间重复一致的朝房。再进到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一组的三大殿，以及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一组的后三殿都是大同小异的重复。而且每个殿、阁、廊、门全都是按照明清两朝的工程做法的统一规格制作的，都是无尽的重复，所以是“千篇一律”的。但我们行走其中，看到它的每一个殿、每一个阁又都不是完全相同，总是有一步一景的感觉，它还是“千变万化”的。

他还跟我们讲了山西大同的应县木